

DOI: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7.007

门洪华、王骁：“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 7 期，第 76—92 页。

MEN Honghua, WANG Xiao,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2008–2018):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acific Journal*, Vol. 27, No. 7, 2019, pp.76–92.

中国国际地位动态研究（2008—2018）

门洪华¹ 王 骁¹

（1.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摘要：2008 年以来，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国际竞合重塑了各国相对地位，国际互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崛起的结构性效应引发全球关注，从世界变局中审视当代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进十分必要。本文通过构建并运用当代国际地位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指出 2008—2018 年中国国际地位呈现全面、持续、快速上升的总体态势，这种态势以国家战略资源规模快速积累为基本路径，在国际互动进程中不断提升全球价值体系中的竞争力，增强对国际投资市场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新战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从全球、亚洲、东亚三个层次选取美国、印度、日本进行国际地位演进的全方位比较，提出如下建议：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弥补关键领域短板，丰富战略资源积累路径；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大国零和博弈，拓展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推动新多边主义合作，引领全球和地区发展议程，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关键词：中国；国际地位；国家战略资源；国际互动；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9)07-0076-17

2008 年以来，全球化中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国内外关于大国国际地位的迷思不断蔓延，从学界讨论转变为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一方面，

国内外学者关于大国国力消长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②其中中国“全面超越”论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综合国力自 2010 年与美国持平后，目前已实现全面超越，^③有学者更进一步认为中国凭借其文化优越性与历史特殊

收稿日期：2019-05-15；修订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8JZD05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门洪华（1969—），男，山东东营人，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大战略理论、大国战略比较、中国战略思想史、软实力理论与实践研究；王骁（1990—），男，山东济南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制度。

*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18 年 7 月 26 日第 2 版。

② Christopher W. Hughes,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5, No.4, 2009, pp.837–856; Michael Beckley, “China’s Century? Why America’s Edge Will End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3, 2011, pp.41–78; Charles L. Glaser, “A U.S.–China Grand Bargain? The Hard Choice between Military Competi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4, 2015, pp.49–90;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3, 2017, pp.91–104;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1, No.3, 2017, pp.271–285.

③ 胡鞍钢等：“大国兴衰与中国机遇：国家综合国力评估”，《经济导刊》，2017 年第 4 期，第 14–25 页。

性,在获得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之后,将在21世纪开始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转移整个世界的重心。^①与中国国力快速崛起相对,关于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相对衰落”还是“战略收缩”也引发了深层次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实力仍处于增长进程,只是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背景下“相对衰落”。^②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处于结构性转型的动态进程之中,国际竞争的实质已经发生重要变化,重塑了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地位。经济活动组织形态由国际贸易向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转变的进程中,科技创新与新型产业在国家参与全球价值体系当中的作用更加突出。^③国际经济竞争已从产品的竞争转变为以科技实力、基础设施便利度、产业结构完整度等要素为基础资源,在全球价值体系的特定生产阶段中增值能力的综合竞争。^④这种背景下,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引领协同治理的作用更加关键,^⑤带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议程。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自身发展进程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进入深层次互动阶段。国际上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各种疑虑和猜忌不断增加,如何做出正面解释和回应,减小发展的外部阻力,是必须面对的问题。^⑦因此,在全球政治与经济形势大变革的时代,对本国和他国国际地位的全面认知和深入把握,有重要战略意义。一方面,分析中国发展在全球与区域经济政治生态中所处的新方位,进而界定中国国家利益优先级,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谋划发展方向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他国国际地位的认知与国际地位的多层次比较,可以增强对国际交往规律的全面准确把握,正面回应国际政治学界的疑惑,是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主动创造战略机遇的迫切需要,是中国与世界构建良性互动的理论基础。

中国学界涉及国际地位的研究较为丰富,截至2019年5月底,以“国际地位”为主题的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文献逾260篇。但从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宏观视角对中国国际地位进行系统分析的著述较少,^⑧缺少国际地位评价的分析框架,甚少对中国国际地位进行国际比较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构建国际地位评估的指标体系,确立国际地位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演进路径与特点,就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提出战略建议。

一、国际地位演进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

1.1 国际地位基本概念与分析框架

通常而言,地位、身份、角色等概念指人或

① [英]马丁·雅克著,张莉、刘曲译:《当中国统治世界》,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95-315页。

② [美]约瑟夫·奈著,邵杜译:《美国世纪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9-30页。

③ Frederick W. Mayer e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 Value Chain Worl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2, 2017, pp.129-133.

④ Rudolfs Bems and Robert C. Johnson, “Demand for Value Added and Value-added Exchange Rat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9, No.4, 2017, pp.45-90;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 Jan. 24, 2019, McKinsey & Company,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innovation-and-growth/globalization-in-transition-the-future-of-trade-and-value-chains>.

⑤ Gary Gereff and Joonkoo Lee,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Why Governance Matt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33, No.1, 2016, pp.25-38.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2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⑧ 关于中国国际地位及其界定的代表性文献参见陈岳著:《中国国际地位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张幼文、黄仁伟主编:《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3-2018年版;徐崇利:“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应对WTO的基本战略——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科交叉之分析”,《现代法学》,2006年第6期,第3-13页;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地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21-136页;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后发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25-45页;门洪华:“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国家认同变迁(1982—2012)”,《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第54-66页;张幼文:“新时代中国国际地位新特点和世界共同发展新动力”,《世界经济研究》,2017年第12期,第24-28页。

物在一定数量的群体关系中所呈现出的抽象特点。具备不同地位的个体可选择的行为模式不同,同一地位的个体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范围也可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一国的地位(status)与角色(role)是一组相互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本文认为,一国国际地位的确定与演进,应兼具结构性与进程性,结构性与一国所保有的战略资源相关,进程性则源于运用资源的能力与意愿,表现于国际互动。在当代国际政治实践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同一集群当中是相对确定的,国际地位允许一国选择多重国际角色。

在国际比较领域,近年来诸多国际机构发布了多种综合评价指标,^①一些权威文献和数据库为本文提供了大量数据和思路借鉴,如综合国力研究,确立了国家间横向比较的一种范式。^②综合国力研究对国际地位评估的积极意义体现在:首先,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种评价指标的结构性比较,较为全面;其次,将异量纲指标转换为无量纲指标后进行换算和比较,用数据表示结果,较为直观;最后,使用数学和物理学公式为基础建模,体现出学者对理解国际体系的有益尝试,具有启发性。但是,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综合国力测算不足以直接作为评估一国国际地位的完整依据,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过去的综合国力研究较关注国家“硬实力”的总量测算,突出整体性和结构性,忽视人均净值等非总量因素和国际互动的进程性因素,与国家政治实践中展现出的实力基础上的真实地位可能存在偏差;另一方面,综合国力研究关注于国际体系中结构性因素的整体横向比较,陷入“实力即结果”的简单判断当中。有鉴于此,本文在相关具有公信力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提出国家国际地位演进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国际地位应是在时间维度上,在一致性原则(如空间范围、发展程度、宗教文化)所确定的一定数量的国家集群内,国家凭借主要战略资源的积累与运用,通过国际互动的构建进程,确定的相对位置。各国国际地位的演进以国际权力转移、利益分配、观念引领中的优

先性为核心标志。

国际互动进程必然以国家战略资源为物质基础。在全球化时代到来之前,民族国家诞生之初,国家间常凭借军事及经济资源为基础,以战争与贸易为主要方式进行互动。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国际互动进程主要以和平方式进行。在国际交往中,国家行为依然具有自发的特点,但受到国际共有观念的影响,在战略资源积累的方向上获得优先地位的国家拥有较高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国际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重塑国家战略资源。国家战略资源的异质性使得国际互动的偏好与结果呈现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的偏好与结果进一步影响国家战略资源变动的方向、速度与路径等。

国际地位分析的时间跨度、国家战略资源、国际互动进程三种基本维度,决定了分析的基本原则:其一,整体一致原则,即一国国际地位应体现在特定国家集群当中,该集群内的所有国家应存在国际交往,并具有某些方面的一致性;其二,相对可比原则,即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国家集群内指标体系与分析框架应是确定的,可提供国际比较的前提条件和校正国际地位的途径;其三,结构与进程相结合原则,即在结构

^①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国际贸易与关税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教科文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贸易与可持续发展数据库、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的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年鉴等是其中较有公信力的国际数据来源。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自1989年起以国内生产力、人口、消费指数等方面的340多个标准为基础,对63个经济体的表现进行基准测试,发布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瑞士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世界竞争力指数年度报告,则以经济水平、劳动力市场、教育质量等12类大项为体系评估各国竞争力水平。本文在借鉴以上指数计算方法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本文统计数据均来自以上数据库,数据更新日期截至2019年6月11日。

^② 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Wilhem Fucks, *Formeln zur Macht*, Deutsche Verlag Anst., 1965;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Westview Press, 1975; 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企划局编:《日本的综合国力:增强日本的国力和国际角色》,大藏省印刷局,1987年版;黄硕风著:《大国较量: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国际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性因素的横向比较中取得各国先赋位置,进而在国际互动的进程中确定实力运用的状况取自致位置,通过各国国际地位的纵向比较,得到各自国际地位演进的方向、速度与路径,再进行横向比较,将进程与结构相结合,丰富分析的层次感(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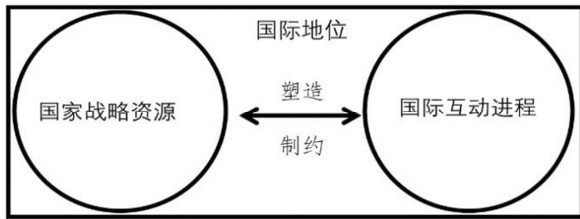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地位演进的分析框架

1.2 国际地位评估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国家战略资源在国际地位评估中的结构性作用在于其是国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当代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竞争环境下,国家战略资源应体现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科研资源、政府资源等 6 个主要方面,^①是当代国家政权生存发展与社会长期存续的基础资源。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衡量一国战略资源过程中,要把握总量规模与人均水平所反映的不同意义。当代各国发展进程中,是否可以持续保障、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成为揭示一国实际治理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镜鉴,从个体视角出发更能体现发展的实际意义。^②有鉴于此,本文综合考量和甄选国家战略资源中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提出如下国家战略资源分指标体系(参见表 1)。

表 1 国家战略资源分指标体系

分指标	子指标	要素	权重
国家战略资源	自然资源	人均耕地面积	0.25
		人均水资源	0.25
		能源消耗量	0.25
		电力产量	0.25

续表

分指标	子指标	要素	权重
人力资源		人均受教育年数	0.25
		劳动力总数	0.25
		抚养比倒数	0.25
		教育质量	0.25
经济资源		国内生产总值(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 ^③	0.4
		调整后国民净收入(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 ^④	0.2
		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 ^⑤	0.2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2
军事资源		高任务完成度火箭数量	0.2
		军事人员数量	0.2
		核武器数量	0.2
		军费开支	0.4
科研资源		科研投入总量	0.3
		科研论文总量	0.3
		百万人科研人员	0.2
		人才使用效率	0.2
政府资源		政府支出	0.25
		税收收入	0.25
		储备总额	0.25
		政府效率	0.25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国家实力、战略观念与国际制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② [印度]阿玛蒂亚·森著,任贇、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③ 虽然无论是购买力评价法还是汇率法都存在局限性,但国内生产总值(GDP)依然是在宏观层面测算一国生产力水平的最实用的指标之一。本文选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汇率法和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进行国际比较,参见:UNCTAD,“Gross Domestic Product: Total and Per Capita, Current And Constant (2010) Prices, Annual”, Feb. 7, 2019,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

④ 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参见:世界银行:“调整后的国民净人均收入(2010年不变价美元)”,2018年11月14日,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ADJ.NNTY.PC.KD>。

⑤ 同④。

一国某年度战略资源指标为:

$$SR(k, X) = \sum (SRX_k \times \alpha_X)$$

本文将选取的 2008 年美国相应要素数据赋值为 100, 则 SRX_k 为 k 年度国家战略资源要素 X 相对数值, α_X 是常量, 为相应指标要素 X 的权重。如 2008 年美国总国家战略资源为 100。

国际互动进程方面, 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一国在深度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进程当中, 不断将国家战略资源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最终完成国际体系内部地位的转变。国家与全球经济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产品、价值和资本要素的国际流动。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的形成, 使得国际贸易围绕消费需求形成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环状贸易网络, 一国经济资源的持续获取也必然依靠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和价值体系两种价值增值路径之中。^① 一国相应产业在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以国家战略资源为基础,^② 通过实际贸易活动中的国际互动来最后确认其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位置, 这不以某一国家产业政策为转移, 而是全球市场决定的。^③ 衡量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的进程, 不仅要观测其是否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或价值体系的高附加值产业, 尤其对于中国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 更应注重结合实际国情, 关注参与全球分工的进程是否提供了可持续发展机会和收入公平增长的方式。^④ 本文认为, 在当代国际互动中发挥主要影响的进程有: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制度。国际贸易选取进出口贸易额、价值链宽度 (value chain breadth)^⑤ 为要素; 国际投资选取年度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额 (不含银行、证券、保险) 为要素; 国际制度选取联合国会费出资额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作为量化数据来源。本文将 2008 年美国国际互动各要素数据赋值为 100, 得到统计原点, 他国各要素数据按比例计算得出 (见表 2)。

表 2 国际互动进程分指标体系

分指标	子指标	权重	要素	权重
国际互动进程	国际贸易 ^⑥	0.4	年度进口总额	0.4
			年度出口总额	0.4
			价值链宽度	0.2
	国际投资 ^⑦	0.4	年度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总额	0.5
			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0.5
	国际制度	0.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	0.5
联合国会费出资额			0.5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一国国际互动进程分指标计算公式为:

$$IR(k, Y) = \sum (IRY_k \times \beta_Y)$$

① [英] 理查德·林奇著, 李晓阳、彭芸蕾译:《战略管理(第六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49-152 页。

② Jason Dedrick et., "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9, No.1, 2010, pp.81-116.

③ Petter Gibbon et., "Governing Global Value Chains: An Introduc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37, No.3, 2008, pp.315-338; Jonas Meckling and Llewelyn Hughes, "Globalizing Solar: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1, No.2, 2017, pp.225-235.

④ Raphie Kaplinsky, "Globalisation and Unequalis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7, No.2, 2000, pp.117-146;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S Bulletin*, Vol.32, No.3, 2001, pp.19-29.

⑤ 价值链宽度主要指一国在参与全球分工各个环节中的产业完备情况。它不仅关注一国在全球分工中是否占据价值链条的高附加值部分, 还观测该国产业是否参与生产、营销、分销、设计等各个环节。选取这个要素的意义在于可以全面地衡量各经济体相对位置。参见: Raphie Kaplinsky, "Globalisation and Unequalisation: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Value Chain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37, No.2, 2000, pp.117-146; James Howe et., *No Such Thing as a Commodity Routes to Higher Value Added for SMEs in Developing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8.

⑥ 年度进出口总额统计口径为一国年度货物与服务国际总额, 概念定义参见: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Statistics: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2010*, United Nations, 2011, pp.13-45; 本文国际贸易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数据库: UNCTAD, "Merchandise: Total Trade and Share, Annual", May 21, 2019,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⑦ 本文国际投资统计数据为各国以现价百万美元计算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年度外商直接投资额, 参见: UNCT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and Stock, Annual", Aug. 9, 2018,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其中将选取的2008年美国国际互动进程要素数据赋值为100,则 IRY_k 为k年度国际互动进程要素Y的相对数值, β_Y 为常量,是相应指标要素Y的权重。如2008年美国国际互动进程指标为100。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定义国际地位总指标评估公式为:

$$IS(k) = 0.7SR(k) + 0.3IR(k)$$

其中 $SR(k)$ 为某国k年度国家战略资源指标, $IR(k)$ 为某国k年度国际互动进程指标。^①

二、中国国际地位演进动态分析

中国国际地位界定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完成历史使命的核心议题。^②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转折点、发展历程上的里程碑。^③40余年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路径,中国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主动开启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迅速提升国际地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随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写入中央决议,中国经济再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科技资源均获得了更快的增速。在国际互动层面,1993年首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标志着中国国际合作进入新阶段;1997年,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正式参与到区域金融治理之中;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进入国际贸易治理体系。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以国家战略资源的高速积累为基础,以融入全球与区域治理体系为路径,国际地位呈上升趋势。

2.1 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演进的主要进程

2008年迄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变动,世界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④中国顺应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大趋势,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确立了新的历史方位。根据本文分析框架,中国国际地位演进有如下三个主要进程。

首先,总体呈现全面、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2008—2018年,在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中,中国国家战略资源不断积累。其中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科研资源、政府资源快速增长,人力资源、军事资源总体稳中有升;国际互动进程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意义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制度领域的影响力大幅提升。通过国家战略资源积累与国际互动进程,中国国际地位总指标从2008年的63.66迅速提升至2018年的93.83,年均提升速度为4.40%(见表3)。

表3 中美国际地位总体态势(2008—2018年)

年度	中国	美国	中国占美国比重
2008	63.66	100.00	63.66%
2009	67.60	97.70	69.19%
2010	74.80	99.68	75.04%
2011	80.70	104.16	77.48%
2012	83.95	103.76	80.91%
2013	90.10	102.88	87.58%
2014	93.46	104.48	89.45%
2015	90.69	106.86	84.87%
2016	91.41	107.85	84.75%
2017	93.83	107.76	87.07%
变速	4.40%	0.83%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其次,国家战略资源积累迅速,总量规模优势突出,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见表4)。2008—2018年,中国国家战略资源指标年均增速为4.06%。其中,中国自然资源年均增长

^① 国际互动进程在当代国际交往中作为单独变量来讨论的意义愈加凸显,但因为各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都不尽相同,简单相加是否能体现二者复杂的相关性,又怎样确定各自的比重是主观论证的过程,难以在一篇论文里就将这样宏大的议题概括完整。本文在构建国际地位总指标的同时,也将国家战略资源与国际互动进程两个分指标独立进行统计、比较,以供参考。

^② 门洪华著:《中国国际战略导论(第二版)》,格致出版社,2017年版,第87-88页。

^③ 门洪华著:《中国对外开放战略(1978—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④ 习近平:“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第3版。

5.49%,较好地维持了总量可观的可持续发展土地与水资源储备,积极扩展了能源生产、消费与储备。2011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电力生产和消费大国,但巨大的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使得能源使用效率问题更加凸显。

中国人力资源增长迎来重要拐点,年均增速只有0.13%,但仍是人力资源第一大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开始凸显,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劳动力总量在2016年迎来转折,但作为劳动力总量第一大国,中国依然保有相当于美国近5倍劳动力总量的优势。同时,人均受教育年限年均1.21%和教育质量年均1.53%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力资源增速的减缓。

中国经济资源实现年均8.17%的高速增长。其中,总量指标与人均指标均大幅提高,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增速略高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中高技术含量工业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制造业附加值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直观地表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上涨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出境游客消费占全球出境游客消费总额逾20%,是紧随其后的美国出境游客消费总额的2倍以上。^①

中国军事资源年均增长1.04%。军费支出虽不断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依然维持在1.91%的较低水平,^②且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提升军事人员与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军事装备方面主要投入于常规武器。

中国科研资源年均增幅为5.06%。其中科研资金投入增长最为迅速,年均增长达14.18%,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和工程类论文的大幅增长。然而,百万人中的科研人员数量并没有显著提升,中国人才使用效率持续走弱,科研资源增长面临资金投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的挑战,关键科技领域的短板持续存在。

中国政府资源实现年均6.10%的增速,税收收入实现年均8.70%的增长,包括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在内的储备总额实现年均5.69%的增长,政府效率实现年均12.11%的大幅优化,

表4 中国国家战略资源增速(2008—2018年)

分指标	增速	子指标	增速	要素	增速	
国家战略资源	4.06%	自然资源	5.49%	人均耕地面积	0.88%	
				人均水资源	-0.17%	
				能源消耗量	4.24%	
				电力产量	7.74%	
		人力资源	0.13%		人均受教育年数	1.21%
					劳动力总数	0.13%
					抚养比倒数	-1.04%
					教育质量	1.53%
		经济资源	8.17%		国内生产总值(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	8.10%
					调整后国民净收入(汇率法2010年不变价美元)	8.30%
					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	8.7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56%
		军事资源	1.04%		高任务完成度火箭数量	0.00%
					军事人员数量	-0.85%
					核武器数量	0.00%
					军费开支	11.40%
		科研资源	5.06%		百万人科研人员	0.22%
					科研论文总量	6.90%
					科研投入总量	14.18%
					人才使用效率	-0.53%
政府资源	6.10%		政府支出	11.03%		
			税收收入	8.70%		
			储备总额	5.69%		
			政府效率	12.11%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各类公共事务支出迅速提高。^③以2015年中国政府资源为例,总量为日本2倍以上,美国的近

① UNWTO, "China: Country - specific: Basic Indicators (Compendium) 2013-2017 (12.2018). Tourism Statistics", 2019,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 <https://www.e-unwto.org/doi/pdf/10.5555/unwtotfb0156010020132017201812>.

② The World Bank,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 2019,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MS.MIL.XPND.GD.ZS?locations=CN>.

③ IMF, "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Jun. 8, 2019, <http://data.imf.org/regular.aspx?key=61037799>.

3倍,为印度的近8倍。这一时期,全球化背景与改革开放的进程促使中国不断寻求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着重提升政府效率,成果逐步显现,根据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统计,2017年中国政府治理效率比2008年提高179%以上。^①

再次,中国国际贸易总量跃居全球第一,国际投资市场角色不断转型,国际制度影响力大幅增强(见表5)。中国进出口总额在2010年跃居全球第一,成为经济全球化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关键主体,深度融入全球价值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不断追求拓展价值链宽度,在分工体系内谋求高价值回报产业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姆指出,中国正在新世界贸易秩序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②与此同时,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中国在国际投资市场中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呈递减趋势,而对外投资总额不断增加,实现了国际投资市场上身份的初步转换。这一阶段,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资金投入大幅提高,不仅在联合国等正式国际组织中承担更多出资额度,还通过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制度化举措进一步提高参与全球与区域治理的能力,引领国际发展议程。

表5 中国国际互动进程增速(2008—2018年)

分指标	增速	子指标	增速	要素	增速
国际互动进程	5.60%	国际贸易	5.36%	年度进口总额	6.55%
				年度出口总额	5.69%
				价值链宽度	1.89%
		国际投资	6.29%	年度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总额	2.59%
				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11.46%
		国际制度	9.35%	联合国会费出资额度	11.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	7.56%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综上所述,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总体全面、持续快速上升,国家战略资源快速积累,国际互动进程指标空前提高。

2.2 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战略路径

其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形成中国国家战略资源积累实践成果、理论建设、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是兴国之要,是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2008—2018年,中国国家战略资源各项分指标中经济资源增速最高,达到年均8.15%,促进了政府资源与科研资源的快速积累。中国国家战略资源优势的积累路径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战略路径,以改革开放为基本路线,以“两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把握并积极塑造战略机遇期。2012年,习近平深入阐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中国深化改革的总路线;2015年,中共中央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全面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制定新的战略规划;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

^① The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Oct. 4, 2018,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② Pascal Lamy, “The Doha Round Marks a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Governance of the Old Trade Order to the New Governance of a New Trade Order”, Oct. 1, 2010,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173_e.htm.

供有力支撑。”^①这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体现中国从经济总量大国到追求建设现代化强国,从脱贫致富到追求建设创新型国家,这种理念的转变以中国国民经济规模积累为基础,以中国国家战略资源的主动配置为路径,重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成果,实现从旧模式到新常态的转型,在实践中检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理论与制度三方面优势的有机统一。

其二,从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到引领各国共同和平发展。一国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能力的提升,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中的创新能力来自五个方面,即新产品、新生产方式、新市场、新供应链、新商业组织形式。^②中国崛起是在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进程中,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合作链条,到引领区域和全球创新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相对位置的进程。随着中国更加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中国发展的外部性日益凸显,既成为世界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世界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③中国提出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打造新的开放市场和供应体系,引领东亚开放式和平发展大局;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吸引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额不断增加,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什么威胁。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④

其三,从参与全球治理到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央。2008年迄今,随着国际互动进程的深层次变化,影响中国国际地位演进的内外因素之间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中国在积极变革自身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国家战略资源配置,主动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承担更多大国责任,塑造了自身国际地位的新内涵。^⑤2008—2018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出资额年均增加11.5%,2019年超过日本成为出资额度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会费出资国。^⑥中

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以年均7.56%的速度增加,2015年改革方案后成为除美国与日本以外第三大份额持有国。除此之外,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等其他多边主义国际机制内的地位不断提升,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中国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支柱。”在既有国际机制以外,中国也另辟蹊径,积极适应全球和区域治理公共物品的新需求,以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中的新议程设置与新机制供给为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自身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与竞争优势,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方面,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逐步转向相互依赖、主动引导、双向互动,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深化,^⑦中国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的角色也发生相应转变。中国发起和提出一系列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底色的全球治理新议程、新机制,体现在全球、地区与发展中国家三个层面。在全球层面,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议程,^⑧发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各国协同发展;^⑨在地区层面,中国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AIIB)、丝路基金等新机制的建立,积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治理机制的落实与完善;在发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②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3, pp.32-33.

③ 杨洁篪:“新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写在《国际问题研究》改版之际”,《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1-6页。

④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⑤ 门洪华:“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36-46页。

⑥ 参见:联合国:“2019年会费国应缴纳的会费(所有的金额单位为美元)”,2018年12月14日,联合国网站, <https://www.un.org/zh/members/contribution.shtml>。

⑦ 毕吉耀、张哲人:“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加深”,《经济观察》,2014年第10期,第64-66页。

⑧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2版。

⑨ 张幼文:“‘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发展协同与全球治理创新”,《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5期,第88-94页。

中国家层面,中国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始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汇聚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彰显中国打造新时代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决心。^①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议程与新机制以“共商共建共享”为理念,统筹全球、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多边主义合作大局,提供更切合各国当下需求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通过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中国不断走近全球治理舞台中央,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以经济资源的快速积累为基础,通过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重点关注于科研资源的投入与产出,确保了中国国家战略资源的总量优势;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进程中不断追求提升全球价值体系内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了对外投资总量和国际制度影响力,以自身快速发展引领各国共同协同发展,在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进程中逐步走向全球治理舞台中央。

2.3 两个大局视角下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机遇与挑战

从国内大局看,以经济资源快速积累带动中国国家战略资源持续高速增长并形成了规模效应,这是2008—2018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主要路径之一。但在全球化逐步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出口加工贸易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借助中国劳动力总量、土地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劳动力总量和资本投入边际利用效率等要素正不断衰减,初级原材料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低附加值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局限性不断显现,城乡失衡状况加剧,旧有发展模式弊端凸显。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科研资源增速较快,但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着大而不强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②表现在城乡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的不平衡。尤其在关键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层面,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存在巨大差距,^③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波动较大,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④这种新形势对经济资源可持续增长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指明了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方向。

从国际大局看,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第一,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空间更加广阔,根据自身历史进程和基本国情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获得更多认可。李光耀指出,中国与当前和过去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不会以西方社会荣誉会员的身份崛起,而是希望自己的发展方式被世界接受。^⑤作为历史悠久和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提升国际地位中实践成果、理论建设、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巨大优势,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来源之一。第二,中国引领各国协同发展新议程、新机制的条件更加成熟。从历史经验角度看,国际经济秩序重塑的窗口期一般在大型战争或全球重大经济危机后出现,^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国际秩序变革的窗口期。2008年迄今,中国以社会主义市

①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〇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北京)”,《人民日报》,2018年9月4日第2版。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③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第81-102页;吴敬琏:“以深化改革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期,第4-7页。

④ 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第61-74页。

⑤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蒋宗强译:《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⑥ 徐崇利:“新兴国家崛起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中国的路径选择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86-204页。

场经济的发展为主线,^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链,提升了资本全球配置能力,迅速发展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规划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路线图,即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②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产业价值链的位置发生深刻变革,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发展中国家集群内部,与其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条件更加成熟,主导地区产业链的能力不断提高。第三,中国按照自身和世界各国发展的需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和供给全球治理公共物品的能力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更多大国责任。2019年欧盟峰会召开之际,欧盟委员会首次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新定位进行战略前瞻,认为中国“是全球重要的行动者和领先的科技国家。”^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Carlos Magarinos)认为中国正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负责任的贡献者,是拉动世界经济摆脱危机的积极主力。^④中国在推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开展国际创新和技术合作、引领南南合作新范式等方面将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在区域和周边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将更加凸显。^⑤中国有意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⑥正逐渐扮演理念引领者、智慧贡献者、方案提供者 and 积极行动者等多重角色。^⑦

同时,中国促动国际秩序变革进入新阶段,并引发了角色焦虑。一方面,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关注和疑虑在增多,对华战略发生转向,“中国威胁论”升级,“全面对抗”的大国宿命论和陷阱论屡见不鲜。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大国”(Rival Power),^⑧致力于采取更具“野心”的单边主义行动完成战略目标,^⑨并正打造内部开放、对外封闭的新“阵营”,意图在资本、贸易、科技、安全领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制度合作,以最大程度运用自身现有战略资源,通过更为自利的非中性国际制度来维护国际竞

争中的优势地位,转嫁国内政治危机。^⑩这种权力扩张与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同时发生,表现为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规则和国际制度上的斗争日益加剧。^⑪另一方面,无论中国是否主观上有权力竞争的意愿,其他国家对中国国际角色的猜疑都可能引发被动战略对抗。外部世界不时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咄咄逼人的(assertive)或具有进攻性的(aggressive)超级大国,这样的判定让中国难以接受,可能会增加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甚至敌意。^⑫

三、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国际比较

2008年迄今,世界秩序加速转型,各国发展进程在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层次的互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整体地位相对下降,由美国主导既有国际秩序不断遭到质疑,美国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失去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优先地位,但受到来自中国等新兴大国

① 张卓元:“中国经济四十年市场化改革的回顾”,《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3期,第3-1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5页。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Mar. 12, 201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9-1605_en.htm.

④ [阿根廷]卡洛斯·马格里诺斯:“G20的未来以及中国在其角色”,《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23-27页。

⑤ G. John Ikenberry, “Between the Eagle and the Dragon: America, China, and Middle Stat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31, No.1, 2016, pp.9-43.

⑥ 同②,第60页。

⑦ 门洪华:“推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总结与前瞻”,《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3-13页。

⑧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c.,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

⑨ Michael J. Mazarr, “The Once and Future Order: What Comes After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2017, pp.25-32.

⑩ 周琪、付随鑫:“美国的反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4期,第1-13页。

⑪ G. John Ikenberry, “Why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Will Survive?”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2, No.1, 2018, pp.17-29.

⑫ 张蕴岭:“寻求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50-59页。

的冲击。^①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国际地位动态指标为对象,以空间范围由大及小作为选取原则,在全球范围、亚洲地区范围、东亚次区域范围内分别选取与中国有比较价值的一国作为参照来剖析其相对国际地位。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是冷战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双边关系,其前景不仅决定着两国的福祉,也深刻影响并塑造着世界的未来,为决定人类和平前景的核心要素;^②在亚洲区域,印度在人口、国土面积等方面的体量是显而易见的,1998年以来,印度以新的核大国姿态出现,^③作为区域重要政治力量,印度将中印关系纳入“大国平衡策略”之中;^④在东亚地区,无论从近代史和当代国际政治角度看,日本都是重要大国,而中日关系与相对地位的演变史可谓源远流长,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联系深厚而复杂,两国国家实力的消长更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⑤有鉴于此,本文分别选取美国、印度、日本作为对照,在全球、亚洲和东亚三个空间层面分析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具体态势与主要路径。

3.1 2008—2018年四国国际地位演进趋势比较

2008—2018年,美国国际地位指标继续维持全球第一的水平,中国则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抵近美国,并在亚洲区域范围和东亚次区域范围占据相对优势地位,持续扩大对印度和日本的优势(见表6)。

表6 四国国际地位总指标演进态势(2008—2018年)

年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8	63.66	27.04	52.19	100.00
2009	67.60	27.06	49.68	97.70
2010	74.80	27.64	49.89	99.68
2011	80.70	28.49	52.56	104.16
2012	83.95	28.45	53.10	103.76
2013	90.10	28.80	53.12	102.88
2014	93.46	29.84	53.66	104.48
2015	90.69	30.39	51.88	106.86
2016	91.41	31.19	52.41	107.85
2017	93.83	32.63	53.31	107.76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从演变方向与速度看,美国国际地位呈下降、后上升趋势,2008—2018年美国国际地位总指标年均增长0.83%,增速远低于中国(4.40%)和印度(2.11%)同期水平,但略高于日本(0.24%)。2008—2009年,美国国际地位受金融危机冲击影响较为明显,这种冲击表现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家战略资源增速减缓,国际互动进程相关指标大幅下挫。虽然2010年起,美国国际地位开始恢复上升趋势,但2012—2013年再次受到国际投资市场信心“暴跌”(plummeted)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下降,^⑥国际互动进程分指标受挫,再次动摇美国国际领先地位。

表7 四国国际地位总指标变化比较(2008—2018年)

国家	年均国家战略资源变化	年均国际互动进程变化	年均国际地位变化
中国	4.06%	5.60%	4.40%
印度	2.33%	1.13%	2.11%
日本	0.46%	-0.41%	0.24%
美国	0.77%	0.98%	0.83%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印度是南亚国际地位最高的国家,亚洲地区内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年均增速为2.11%。但中国与日本相对印度仍然保持着巨大的优势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95, No.3, 2017, pp.91-104;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31, No.3, 2017, pp.271-285; Michael J. Mazarr, “The Once and Future Order: What Comes after Hegemony”,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2017, pp.25-32.

② 门洪华:“新时代的中国对美方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第15-24页。

③ 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27.

④ 孙西辉、金灿荣:“地区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54-72页。

⑤ 门洪华:“日本变局与中日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72-90页。

⑥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2013.

(2017年分别是印度国际地位指标的293%和168%)。同时,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更加强劲,是印度增速的两倍以上。在东亚乃至亚洲区域范围内,日本的国际地位依然是仅次于中国的区域大国,并具有重要的全球经济影响力,但从国际地位总指标看,中日之间国际地位差距进一步加大,中国的优势进一步彰显。

表 8 四国国家战略资源演进趋势(2008—2018年)

年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8	71.59	31.24	55.14	100.00
2009	78.27	31.90	54.07	100.40
2010	84.69	32.53	55.30	102.31
2011	89.90	33.10	56.89	103.62
2012	92.81	33.37	56.59	104.39
2013	99.27	33.88	57.27	103.50
2014	102.14	34.74	57.78	104.50
2015	99.49	36.00	57.26	104.77
2016	98.69	37.09	57.29	105.58
2017	102.42	38.44	57.45	107.15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3.2 2008—2018年四国国际地位演进路径比较

进一步说,四国在国际地位变动的方向、路径与速度层面存在较大差异。从国家战略资源领域看,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家战略资源指标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开始受到挑战,中美之间差距不断减小(见表8)。对各子指标及要素的分析表明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是多方面的,如2008—2009年,美国经济资源与各指标应声下挫,随之而来的是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大幅下降15%以上。但与此同时,美国针对经济与金融领域采取政府主导的各项调控措施,同时持续增加政府支出与军费,如2008—2011年,美国政府支出增加7.4%,军费支出增加14.5%。这种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这个时期美国国家战略资源仅在2013年出现小幅下滑。整体看,虽然美国国家战略资源在自然资源、经

济资源、科技资源、军事资源四个方面仍然对中国维持着巨大优势,但中美两国战略资源指标总体差距不断缩小,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科技、自然资源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人力资源与政府资源的积累性优势(见表9)。与此同时,从人均战略资源水平看,中国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如中国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虽在2008—2018年年均增长7.75%,但2018年仅占美国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的11.88%。

印度虽然是南亚地区国家战略资源第一大国,并且经济资源增长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人力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年均增速均高于同时期中国相关资源增速,中印在人力资源、军事资源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印度在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科研资源、政府资源四个方面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且差距不断扩大。在自然资源方面,虽然印度相对中国有更多的耕地资源,但其能源存在严重短板,其电力产量2015年不足中国电力产量的1/4,人均能源不足1/3。在人力资源方面,印度人口结构年轻化水平大幅超过中国,劳动力总量方面持续缩小与中国的差距,人力资源不断获得增长。印度经济资源各要素增速虽低于中国,但在整个亚太乃至全球范围都处于最前列。印度军事人员数量增长的绝对数与增速都相当可观。2008—2016年,印度累计增加武装人员近40万人,同期中国裁撤武装人员19万人左右。

表 9 四国国家战略资源子指标增速比较(2008—2018年)

子指标	中国年均增速	印度年均增速	日本年均增速	美国年均增速
自然资源	5.49%	2.25%	-0.9%	-0.85%
人力资源	0.13%	0.99%	-0.36%	-0.20%
经济资源	8.17%	7.08%	0.94%	1.75%
军事资源	1.04%	1.95%	0.31%	-0.49%
科研资源	5.06%	0.71%	-0.47%	1.04%
政府资源	6.10%	7.26%	2.03%	2.11%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2008年迄今,日本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科研资源领域有微弱的负增长,而政府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年均增速分别是2.03%、0.94%、0.31%,其国家战略资源指标正以年均0.46%的速度提升。继2015年日本科研资源首次被中国赶超后,2016年日本经济资源首次落后中国,同时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军事资源、政府资源方面日本与中国差距不断加大。在国家战略资源总量规模上,中国完成了对日本的全面超越,然而,日本在人均水平、产业结构等要素方面仍具有巨大优势。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达到日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5%,而调整后人均国民净收入不足日本的14.1%。中日、中美人均国家战略资源的巨大差距显示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互动进程领域,美国、中国和日本都明显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尤其在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波动(见表10、表11)。2010年美国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008年的88.1%。与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额持续上升的趋势不同,2015年美国接纳外商直接投资额才超越其2008年水平。然而,美国依旧保持在国际价值体系中的有利位置、国际投资领域的绝对优势、国际制度内的支配地位。2017年美国国际互动指标是中国的147.97%,中美在国际投资与国际制度影响力领域的差距仍然巨大。2017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中国的7.3倍以上,美国接受外来投资总额为中国的2倍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经15次改革,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百般拖延,最终仅出让给新兴经济体6%的投票权,2018年中国投票权为6.39%,仅为美国的36.8%,^①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为2.75%,排全球第8位,日本为6.46%,排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②这深刻反映出国际制度影响力与国家战略资源水平之间的不对等。

表10 四国国际互动进程演进态势(2008—2018年)

年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8	45.18	17.24	45.29	100.00
2009	42.70	15.78	39.46	91.40
2010	51.72	16.25	37.28	93.57
2011	59.25	17.74	42.44	105.41
2012	63.29	16.96	44.95	102.30
2013	68.70	16.93	43.44	101.44
2014	73.22	18.40	44.05	104.45
2015	70.16	17.29	39.32	111.73
2016	74.43	17.44	41.04	113.15
2017	73.78	19.08	43.64	109.17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数据计算。

印度已经是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大国、人力资源大国与军事大国,处在从南亚大国向亚太大国的跨越进程中,也是崛起最快、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以及联合国出资额等指标均不足中国相关数据的50%,2017年度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额为中国的29.28%,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中国的9.07%。^③

日本在国际贸易总量方面与中国差距不断扩大,但日本在2014年超越瑞士成为全球价值链宽度最高的国家,在全球价值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中国从2008年的全球56名快速上升到2017年的第29名。^④在国际投资方面,日本

① IMF, "Quota and Governance Publications: Quotas - Data Update and Simulations - Statistical Appendix", 2016,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pubs/>; IMF, "Quota and Governance Publications: 2010 Reform", 2010,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pubs/>; IMF, "Quota and Governance Publications: Quotas - Data Update and Simulations - Statistical Appendix", 2008—2018,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pubs/>.

② IMF, "Quota and Governance Publications: Quotas - Data Update and Simulations - Statistical Appendix", 2016,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fin/quotas/pubs/>.

③ UNCT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and Stock, Annual", Aug. 9, 2018,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④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Report 2018", Oct. 16, 2018,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18>.

2017 年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资本全球配置优势依旧强劲。在国际制度

方面,日本相对地位则不断下降,但依然保持着亚洲领导者的微弱优势。

表 11 四国国际投资总量占世界比重比较(2008-2017 年)

年份	年度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重				年度接受外来直接投资占世界比重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中国	印度	日本	美国
2008	3.28%	1.24%	7.51%	18.10%	7.29%	3.17%	1.64%	20.63%
2009	5.13%	1.46%	6.78%	26.13%	8.06%	3.02%	1.01%	12.18%
2010	5.01%	1.16%	4.10%	20.22%	8.36%	2.00%	-0.09%	14.44%
2011	4.77%	0.80%	6.88%	25.36%	7.91%	2.31%	-0.11%	14.66%
2012	6.41%	0.62%	8.95%	23.23%	7.69%	1.54%	0.11%	12.64%
2013	7.81%	0.12%	9.83%	21.97%	8.69%	1.98%	0.16%	14.13%
2014	9.76%	0.93%	10.37%	23.36%	9.60%	2.58%	0.90%	15.07%
2015	8.98%	0.47%	8.28%	16.19%	7.06%	2.29%	0.17%	24.24%
2016	13.31%	0.34%	9.86%	19.05%	7.16%	2.38%	0.61%	24.48%
2017	8.72%	0.79%	11.22%	23.94%	9.53%	2.79%	0.73%	19.26%
变速	11.46%	-4.89%	4.55%	3.16%	3.02%	-1.41%	-8.64%	-0.76%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接受外来直接投资负值体现国际投资非正常产权转移。^①

四、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举措

上述大国国际地位沉浮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面对世界现存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②如何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远见,沉着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竞争新形势,推动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塑造新战略机遇期的关键。本文认为,中国应采取如下针对性战略举措。

其一,深化改革开放,弥补关键领域短板,丰富战略资源积累路径。国家战略资源的积累与运用是国际地位演变的基础,中国国家战略资源积累要继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结合各国发展现状的世情,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期、动能转换期、结构调整期,需要进行切实有效的深化改革。中国应主动适应国内国际市场变化,优化战略资源配置效率,借助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将产业升级与金融体系

优化、对外开放与提升国际投资市场影响力相结合,掌握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动权。^③另一方面,更加坚定建设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决心,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④在继续保持科研资源大量投入的基础上,减少制度成本和资源浪费,实现精准快

^① 以现价百万美元为单位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expressed in US dollar at current price in millions)为统计口径,参见:UNCTA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ward and Outward Flows and Stock, Annual”, Aug. 9, 2018,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② 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

^③ 龚强、张一林、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经济研究》,2014年第4期,第4-16页;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0期,第30-59页;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7-22页。

^④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第2版。

速的科研资源配置;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应不断优化整体人才资源结构,深化城镇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提高人才与产业结合的效率,发挥政府资源规模优势,助力劳动力总量与质量双重比较优势的形成。在优化国家战略资源积累与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议程的对接,协同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发展布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①

其二,坚持和平发展,避免大国零和博弈,拓展国际合作战略空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 升需要树立正确的大局观和角色观。中国应站在世界与民族发展历史的高度,面向世界秩序的未来,作出审慎有利的战略谋划,增强国际互动进程的管控。中美关系在未来很长时间依然处于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中心,是未来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产生进程中的最大变量。在当前和未来中美竞合的新情势之下,中国要全面认识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加强战略对话,审慎管理危机与分歧,在厘清国家利益优先级的基础上避免核心利益冲突,防止双方反应过激和第三方因素导致中美陷入新冷战;也要清晰认识到美国国际战略转变带来的新的战略机遇,主动适应双边互动模式的新局面,既要丰富国家战略资源积累路径,也需增强运用国家战略资源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在双边多层次议题中适时发现合作意愿、创造合作机遇。同时,全球国际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中国需要准确识别和妥善利用新的利益分歧点与汇聚点,更加积极主动地拓展与区域和全球各层次伙伴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密切互动,^②深化与欧盟、东盟等多边组织的多轨合作,辩证认识印度、日本等区域大国的核心利益关切,重视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护,推动基于共同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要主动创造新的战略空间,综合运用峰会外交等战略路径不断取得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的突破,构建更加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③

其三,推动新多边主义合作,引领全球和地区发展议程,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二

战后的国际多边主义合作以单一霸权国提供基于规则的强制性解决方案为基础,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规则的全球化。^④然而,这种大国主导的多边主义合作绝非多边主义合作的唯一形式和必要条件。^⑤当今全球价值体系和产业分工日益成熟,虽然各国价值链宽度存在差异,但分工体系的秩序并非等级制,而是全球市场决定的。全球市场生产关系与份额的变化不仅使得美国主导国际多边主义合作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对下降,也使得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多边主义的积极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在全球多边主义和地区事务治理中的角色呈现出新内涵。这种互动关系要求中国适应和引领新型全球化,推动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多边主义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旗帜鲜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等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多边贸易治理体系并支持其深入改革,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中国应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大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深化大国战略合作。在地区层面,中国应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引领地区协同发展议程,善用其卓越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巨大的市场等优势,在地区价值链整合上发挥主导作用,以“一带一路”为战略抓手,以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制度化努力为突破,推动地区经贸一体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在互联互通、共

① 门洪华:“‘一带一路’与中国—世界互动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5期,第4-21页。

② 何志鹏:“国际法治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2页。

③ 门洪华、王骁:“中国峰会外交(1993~2018):发展进程、战略评估与未来展望”,《当代亚太》,2018年第6期,第133-157页。

④ Michael C. Webb and Stephen D. Krasner,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5, No.2, 1989, pp.183-198; Ian Clark, “Bringing Hegemony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1, 2009, pp.23-36.

⑤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0页。

同发展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地区发展与安全需要的多元包容国际制度供给模式。中国亦应积极运用其自身战略资源优势,加大对地区安全、政治、科技、生态等治理议程的投入,优先供

给地区国际产品,进一步增强区域国际影响力,塑造地区国际秩序变革的有利条件。

编辑 邓文科

Dynamic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2008–2018)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EN Honghua¹ WANG Xiao¹

(1.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Since 2008, the world order has accelerated its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have reshaped the relative status of countries,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China's rise have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the changing global landscape. By constructing and applying the framework and index system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tatus analysi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presents a general trend of comprehensive, sustained and rapid rise from 2008 to 2018. Such a trend is based on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s enhanced by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s in the global value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system.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brings new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 the US, India, and Japan, and proposes the following three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China: It's supposed to (1) continue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up comprehensively, address the inadequacies in key technologies, and expand the path of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 (2) adhere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avoid falling into a zero-sum game trap with major powers, and expand strategic spa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 push for new multilateralism cooperation, take the initiative in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da-setting,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y capacity.

Key words: China; international status; national strateg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 comparative analysis